

# 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魏颖 张春艳

**【提要】**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是一个极有趣的研究主题,事实上,所有研究者讲述的都是一个不平等背后的家庭故事,其深层的理念是寻求一种平等机会与经济正义的社会实现。Becker and Tomes“效用最大化的家庭行为”模型为不平等的代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此后,国外研究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代际收入弹性研究,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国际比较研究等。国内学界应从理论模型的建构、经验研究的进展等方面予以重视和借鉴。

**【关键词】**代际转移 代际流动 收入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4-0097-06

## 一、理论模型的建构

社会学家们曾展示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孩子的职业、教育及其他特征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久远至1889年,John Dewey写道,“从平均趋势看,父母超过或低于均值的孩子,他们自己偏离均值仅仅是他们父母偏离的三分之一……像穷孩子更富和富孩子更穷的比率为三分之二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Zimmerman(1992)认为,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承继”了父母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平等机会和经济正义的争论基础”。<sup>②</sup>

Becker and Tomes(1986)认为,<sup>③</sup> Schumpeter(1951)是仅有的从理论到实证系统思考代际流动的主要经济学家。在前辈经济学家和更多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他们从经济理论出发开始对收入代际转移问题进行模型化分析。Becker and Tomes(1979)指出,<sup>④</sup> 收入分配的全面分析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

是相同家庭不同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就是通常被称作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是同时代中不同家庭的收入不平等。正是Becker and Tomes(1979, 1986)首次建立经济学模型解释代际收入相关问题,其经典研究,为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sup>⑤</sup>

<sup>①</sup> Dewey, John, Galton's Statistical Methods,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no 7, 1889, pp 331-334.

<sup>②</sup> Zimmerman, David, Regression Towards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992, pp 409-429.

<sup>③</sup> Becker, Gary S. and Nigel Tom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3), 1986, s1-s39.

<sup>④</sup> Becker, Gary S. and Nigel Tomes,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1979, pp 1153-1189.

<sup>⑤</sup> 这是国外收入代际转移问题研究的理论模型之一,其他诸如交换模型、自我中心主义模型及非预期的遗产模型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Becker and Tomes (1979) 在《收入分配与代际转移的均衡理论》中, 假设每个家庭在跨代际间最大化其效用, 并进而提出了不平等与代际转移的理论, “人力资本模型表明, 不平等能够产生于最大化行为, 而不是主要依靠运气和其他随机力量; 社会互动的经济研究方法认为, 个体不是独立的而是家庭的一个部分, 其成员跨越几代之久, 他们贡献家庭收入的生产和对承继家庭未来的孩子的眷顾。”他们指出, 代际转移度量的是家庭对孩子财富(福利)的影响。当遗传程度和投资倾向越来越大的时候, 家庭就越重要。

1986年, Becker and Tomes 发表了《人力资本与家庭的兴衰》。文中指出, “孩子的成就相对于父母来说趋向或偏离均值的回归程度是一种对社会中机会平等程度的测度”, 可以说, 在 Becker and Tomes 的语境中, 代际流动、家庭兴衰与不平等机会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统一的整体。Becker and Tomes 认为, 这篇论文与其1979年的文章在精神实质上最为接近, 但有相当大的进展。至此, 用 Becker and Tomes (1979) 的话来说, 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代际流动), 即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的研究, 可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分析, 即不同代的不同家庭的收入决定理论。

## 二、经验研究的进展

Becker and Tomes 模型为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 此后, 国外研究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国际比较研究, 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等, 下面就主要研究内容从数据、方法、结论到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做简要评述。

### 1. 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早期关于父母和成年后孩子的经济地位间的统计关系的研究, 发现仅有微弱的联系。Behrman and Taubman (1985) 估计了对数收入

的父子代际相关为 0.2 或更小, 并且得出结论, “样本成员来自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sup>①</sup> 基于很多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 Becker and Tomes (1986) 得出结论: “除了因歧视受害的家庭, 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向收入均值的回归显然是快速的……三代之内, 几乎所有先辈在收入方面有利及不利地位都会被一扫而尽。”1988年, 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 Becker 表达了一种广泛共识, 他总结道: “高低收入一样不会顽强地父代子传。”<sup>②</sup> 这种种结论刻画出了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

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对于高度流动性的研究结论与所谓社会底层代际化之间的矛盾, Gary Solon (1992) 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是政治导向的文字强调了虚构的代际转移, 还是统计数据的分析出了问题?”<sup>③</sup> Gary Solon (1989) 曾指出,<sup>④</sup> 先前的结论是建立在已被估计出来的代际相关性的基础上, 因为测量误差、同质性样本及两者的互动, 这种代际相关性被大大低估。经过十年, Gary Solon (1999) 再一次说明, “导致这些结论的多数研究, 采用的是单年收入测量, 在很多情况下, 衰减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被对特殊的同质性样本的依赖所强化。”<sup>⑤</sup> 总的来说, 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局限于数据与方法的欠缺, 采用单年收入数据, 大大降低了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估计值。

正是对这种基于早期研究结论之上的社会判断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的深入思考, 随着数

① Behrman, J R and Taubman, P.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Estimates and a Test of Becker's Intergenerational Endowments Model.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 (1), 1985, pp 144-151.

② 转引自 Solon (1992), 及 Zimmerman (1992)。

③ Solon, Gar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992, pp 393-408.

④ Solon, Gary, Biased in esti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Correl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 1989, pp 172-174.

⑤ Solon, Gary,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A, in Orley C.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 ed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9.

据与方法的改进，在 1990 年代，美国掀起了代际收入流动研究的一股新的高潮。众多学者开始了对代际收入弹性的重新估计，经校正的很多结果是美国早期研究均值的三倍 (Bowles and Gintis, 2002)。<sup>①</sup> 其中，Solon (1992) 和 Zimmerman (1992) 利用父代在几年内的平均收入作为变量，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 0.4，是单年收入数据估计的两倍。Solon (1992) 在《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中写道，“建立在代际数据 PSID 基础上的新的估计意指长期收入的代际相关至少是 0.4，这指出了比早期研究所指明的流动性有剧烈的减小。”

近来更多的美国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证明来自于两组调查，PSID 和 NLS。多数美国文献集中在父子收入的相关性，但是 Chadwick and Solon (2002) 的研究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代际研究不仅包括了儿子还有女儿，不仅考虑了个人收入还有家庭收入。<sup>②</sup> 美国文献突出了测量父子收入的一些关键问题。为了减少测量误差，目前美国的研究，更多采用父亲的多年收入测度和儿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最初几年之后的收入测度，估计出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 0.4 或者更高。应该说，这种结论并没有超越 1990 年代的研究成果，几乎在相同程度上刻画了一个比先前研究所描绘的流动性更小的社会。

## 2 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认识到代际收入弹性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进步。”这是 Gary Solon (1999) 对美国 1990 年代的代际收入弹性研究成果的评价。正是因为这种进步，父母的收入才成为其子孙收入的一个相当强的预测。但是，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只是不平等代际转移研究的最基础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分析代际收入转移背后的传递机制。美国学者曾经做了大量的兄弟间相关关系的估计，并将其与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比较。其结果表明，影响孩子收入的家庭和社区背景的大部分因素，实际上与父母收入不相关。“这些神秘的背景因素是什么，及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Gary Solon (1999) 写道，这是“一个迷人又有价值的难题”，是“进一步

研究的重大而艰难的挑战”，并且认为，“找到更可靠的实证证据来回答这个难题，需要非凡的创造力。”

如前文所述，Becker and Tomes (1979, 1986) 模型为不平等的代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对代际传递机制进行分析。Eide and Showalter (1999) 应用分位数回归估计了代际收入流动模型，当把教育年限纳入回归方程后，家庭收入的系数降低了 50%，表明教育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同时，他们发现教育在儿子收入分布的底端相对来说更有价值，这样一来倾向于压缩分布。<sup>③</sup> Restuccia and Urrutia (2004) 得到了类似的结果。<sup>④</sup> 在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研究中，Bowles and Gintis (2002) 的估测说明，认知能力和教育已经被过度研究，而财富、种族及非认知行为特性研究不足。

尽管 Eide and Showalter (1999) 研究发现父亲的收入（或者家庭收入）是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变量，但是他们也发现，大多数联系源于迄今没能解释的其他家庭影响。“基本的问题不是测度合适变量的粗劣，而是我们完全错失了一些重要变量。” Bowles and Gintis (2002) 认为，更多的问题是，“代际游戏场内的规则是否合理？代际经济地位转移背后的因果机制是什么？这些机制是否积极响应公共政策，使得经济成就的获得更加公平？”通过分析代际经济地位传递背后的机理，试图打开代际经济地位传

① Bowles, S. and Gintis, H.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3), 2002, pp 3-30.

② Chadwick, Laura and Solon, Gar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mong Daugh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92: 1, 2002, pp 335-440

③ Eide, E. R. and Showalter, M. H.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Earnings Across Generations: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4 (2), 1999, pp 253-267.

④ Restuccia, D. and Urrutia, C.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arnings: The Role of Early and College Educ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5), 2004, pp 1354-1378.

递路径的“黑匣子”，这不仅是 Bowles and Gintis (2002) 的愿望，更是众多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 3 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分析及国际比较研究

“更大的进展将会来之不易。”早在 1999 年，Gary Solon 就已指出，“我们将继续用常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模型的常规估计，但是，这种分析可能不会解决太大的问题”，并且认为，代际研究要转向能够产生新的视点与观察的新数据，有时可能是相当特别的数据，像双胞胎分养或没有亲缘关系的人领养兄弟等。尽管 Gary Solon 承认“没有一个这样的实验能够达到清晰又确定的理想状态”，但是他确信“对所提供证据的审慎而明智的解读，依然可能产生关于劳动力市场地位代际转移背后的变化过程的重要线索。”事实上，近年来学界所关注的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分析及跨国差异比较等主题研究，都是以探究代际收入流动背后的传递机制为最终目的。

在过去的 15 年里，大量新研究已经证明，美国经济地位的代际转移比早期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所主张的更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究代际流动的趋势。因为数据缺乏，美国代际流动趋势的研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歧结果。Solon (2006) 认为，<sup>①</sup> 通过更有效利用可得到的 PSID 数据，能够得出更可靠的证明。尽管“我们的估计仍是太不精确以致于不能勾划出在每个方向上的适度趋势”，但是，在更高程度上，Solon (2006) 的结论是，“对于出生在 1952~1975 队列的结果显示，美国的收入代际流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没有产生剧烈变化。”

学者们认为，对于经济地位由一代传递给另一代程度的跨国研究是重要的。Solon (2002) 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解释代际流动的跨国差异。<sup>②</sup> Anders Bjorklund and Markus Jantti (1997) 研究认为，“瑞典有着更小的收入不平等和更大的代际流动，这提出了关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否彼此独立的问题。”<sup>③</sup> 当然，这不可能仅由两个国家的样本决定。一些关于社

会阶层流动的社会学文献提供了相关佐证。采用 15 个国家的样本，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1)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等倾向于和更高的社会流动联结在一起。<sup>④</sup> Anders Bjorklund and Markus Jantti (1997) 相信，“代际收入流动的跨国比较有可能指明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这一经典和中心问题”。

### 三、我们应该借鉴些什么

如前文所述，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是一个极有趣的研究主题，事实上，所有研究者讲述的都是一个不平等背后的家庭故事。代际流动是加快了还是减缓了，这将意味着是子代有着更多的机会了，还是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父代，尤其是对于处在收入底层的子代，有多少机会走出父代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从贫穷变成富有”。<sup>⑤</sup> 学者们的初衷与目的亦不过如此，但其深层的理念是寻求一种平等机会与经济正义的社会实现。在前文对国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总结与评述，并且从理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方法及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殊性等方面探讨应该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借鉴些什么。

1 中国人的家庭行为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家庭行为分析”，对中国问题研究来说应该更有意义。

从 Becker and Tomes 的理论模型中可以推

<sup>①</sup> Chul-In Lee and Solon, Gary.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Working Paper 120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sup>②</sup> Solon, Gary,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3), 2002, pp 59-66

<sup>③</sup> Anders Bjorklund and Markus Jantti,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Sweden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5), 1997, pp 1009-1018.

<sup>④</sup> 转引自 Anders Bjorklund and Markus Jantti (1997) .

<sup>⑤</sup> “从贫穷变成富有”，这种看起来很简易的表述，却蕴含着极丰富的专业主题和社会意义。参见 [美] 伊兰伯格·史密斯著《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六版）》，潘功胜、刘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4 页。

论，代际流动度量的是家庭对孩子财富（福利）的影响。在《人力资本与家庭的兴衰》中，Becker and Tomes（1986）指出，“孩子的成就相对于父母来说趋向或偏离均值的回归程度是一种对社会中机会平等程度的测度”，其语境中，代际流动、家庭兴衰与不平等机会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统一的整体。Becker and Tomes（1986）对所建构的模型充满信心，认为“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家庭行为分析”不仅“为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兴衰提供了很多洞见”，而且“有助于理解关乎家庭兴衰的各种不同公共项目的效力”。

费雪（有译菲歇尔）曾说，“收入是经济学的起点和终点”。<sup>①</sup>这是历来经济学家中对收入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质性特征的最精辟描述。家庭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同样可以说，“家庭是中国人社会行为的起点和终点”。只有对家庭行为的深刻理解，才能更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现状，才能更透彻了解中国社会存在的所谓各种“病状”，才能更现实地预测各种相关政策的影响及效力。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家庭行为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这是能够激发中国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研究的一种特别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Becker and Tomes 的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家庭行为分析，对于中国的相关问题研究来说，可能将会更有意义。

2 目前，国内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研究极少；国外的实证研究，仅从 Becker and Tomes（1979，1986）模型开始，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他们所累积的经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借鉴。

从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到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分析，再到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代际收入流动跨国差异比较，这些研究内容是一步步拓展的结果，是历经二三十年的研究积累所展现出来的学术视野，这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是有前车之鉴的。1970年代与1980年代，由于测量误差，同质性样本，及两者的相互作用（So-

lon, 1989），弹性估计出现重大偏误。随着1990年代数据与方法的改进，美国学者开始对代际收入弹性重新估计。经校正的很多结果是美国早期研究均值的三倍（Bowles and Gintis, 2002）。这背后的研究动力是基于早期研究结论之上的社会判断与真实世界的严重不符。

通过文献的梳理、总结及评述，从国外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实证研究进程中，我们至少可以论及如下两点：

其一，从社会现象出发，对社会现象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始终是实证及学术研究的最基本起点，同时，更是检验研究结果正确与否的最终试金石。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堪称奇迹，但不平等的代际复制是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一种发展倾向。从社会问题出发，进行详实的实证研究，并不断地将分析结果与社会现实相对照，从而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机会，为最易受伤害的群体融入社会提供一个跳板，为即将或已经陷入代际贫困的家庭与个人提供最有效的社会支撑，这是研究者的使命。

其二，国内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研究极少，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数据缺乏。其实，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研究的最大障碍。首先，美国的最初研究并不是从丰富的数据开始，其研究数据亦是从缺乏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其次，美国的研究在深入分析及纠正估计结果偏误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可供借鉴。目前，完全可以在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国内相关问题研究的后发性进展，推动国内代际研究数据的逐步生成，而且可以增加国内外研究的可比性。

3 转型与发展的中国，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sup>②</sup>或许可以通过机会不平等与结果不平等的

① 参见菲歇尔著《利息理论》，陈彪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不同时点及不同时期的对比,发现中国整体收入分配方面的特殊性。

中国经济在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成为争论与关注的焦点;而且,基尼系数的高与低,几乎成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大与小的通用标准。事实上,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判断。基尼系数所测度的是结果的不平等,而代际收入弹性所测度的是机会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代际收入弹性是较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标更为关键的测度方式。基尼系数的高低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代际(社会)流动的大小,后者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整体状态及社会发展趋势的核心问题。

在收入代际转移问题的研究中,实证分析的目的在于回答诸如代际收入弹性大小,代际收入弹性的趋势变动,及其弹性大小与趋势走向的相关传递机制等问题。对于中国的研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尝试将代际收入弹性所测度的机会不平等与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洛伦茨曲线及分位数比等测度的结果不平等两相比较,从中找到两者的异同。

目前,国外的相关实证分析中,以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为主,其他所谓“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极少。<sup>①</sup>整体社会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是否彼此独立,则是一直在探讨中的问题。Anders Bjorklund and Markus Jantti (1997)确信,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跨国比较有可能指明这一“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经典和中心问题”。中国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研究应该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不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更深入的解释力,而且可以做相应的跨国差异的比较,从而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进展。

本文作者:魏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博士后研究人员;张春艳是吉林大学公  
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马来西亚约为0.26 (Lillard and Kilburn 1995),这是对所谓“欠发达地区”研究最早的一个个案。南非的研究为0.44 (Hertz 2001)。近十多年来,相关地区的研究进展并不是很大。

## A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Wei Ying Zhang Chunyan

**Abstra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income inequality is an extremely interesting research subject. In fact, all researchers are telling some family stories behind the income inequality. The model of “analysis of family behavior” by Becker and Tomes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hereafter, the overseas researchers have launched massive empirical studies, mainly inclu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nd so 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advances of the empirical studies, and w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come inequality